

20

大家西学

民主二十讲

刘军宁编

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是给人民为自己谋幸福创造机会

Democracy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家西学

Democracy

民主二十讲

刘军宁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二十讲 / 刘军宁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大家西学)

ISBN 978 - 7 - 5006 - 8146 - 5

I. 民… II. 刘… III. 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474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民主二十讲

编 者 刘军宁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ice@263.net

丛书编辑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馨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6 - 8146 - 5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调换。电话：010-64411910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做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我们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包括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的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 19 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 世纪初，尤其是 1905 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 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莫先生”(道德, Moral)、“洛先生”(法律, Law)等等, 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 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 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 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 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 而是舶来的。今天, 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 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 但是, 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 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 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 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 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 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 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 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 首批分为两辑, 一共30种。

具体来说, 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 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 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 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 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 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 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 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 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 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所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年7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刘军宁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字眼，就不陌生。它在当时指的是，无需征求臣民的意见就可以事事替他们做主的君王。所以，这里的“民（之）主”其实是君主。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北岸，雅典人对“民主”这个字眼也不陌生，把它理解为“（公）民（为自己的一切事情做）主”，或者说，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们的事务做出决定。就后一种意思上的民主而言，古希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存在民主政治的地方。

雅典城邦的古代民主给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灵感。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这番话，今天仍在激发着人们对民主的热情向往：“我要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这

番话仍然激励着当代人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

经过两百多年来数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有 60% 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民主政治首先指的是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自愿同意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做主，即所谓代议民主。作为一种进步，现代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当家做主，或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治者”，而是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现代民主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现代民主政治是代议（制）民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凡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所以，即使是作为直接民主发源地的希腊今日也改行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即是公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务。在代议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公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政府公务员不过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权。代议制度的核心是由经普选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作国会。正是因为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托，他们的作为必须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托。例如，如果政府不经过代表的同意，就无权对公民征税。

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自由活动的政党政治。如何处理党争，也一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难题。然而如果取缔政党，或只保留一个执政党，其所带来的灾难，却远远大于党争。况且，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一方面，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少数人的保

护，而少数人永远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少数派需要通过政党的形式积累扩大力量，多数派需要靠政党的形式去巩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结党的权利与自由来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参政权。结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结党自由。在这样的宪法权利的保护之下，公民可以自由地结成政党来参与政治，通过竞争获取国家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在代议制的自由民主之下，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与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就必须结成政党。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在自由民主下，不同的政党及不同政治见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范围。在自由民主下，不论多么强大、多么得势的政党都不可能左右一切。在现代政治中，竞争和对立是自由民主中的常态，只要各个政党之间彼此宽容妥协，相互监督制衡，循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参政议政，放弃用暴力的手段解决政治上的分歧，政党政治就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和武力的对抗，反而带来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现代政党政治虽有弊端，“但幸门户繁多，不致使一党得以专横”（严复语）。所以，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

民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治依据尊重个人价值

与尊严的道德原则，个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美国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学者安·兰德提出，自由民主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是经过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贯穿在自由民主中的是自由、平等的原则。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所以，民主政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安·兰德的文章中，民主政治与自由民主含义相同，交替使用。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现代形式的民主还是古代形式的民主，也无论它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要求全体公民大会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不复存在，民主也就寿终正寝了。正是自由主义使民主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自由与民主相互结合互相强化。个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区别自由民主与其他民主类型的根本尺度。应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并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即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在价值上，民主政治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体制上，民主政治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

自由民主认可并奉行政治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政治运动、政治党派的存在。自由主义对政治多元主义的接受来自其主张“宽容”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也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其他两者而独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竞争也是自由民主的根本特征之一。自由民主意味着程序民主。自由民主是一种做出决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纯地规定主权的归属。这种程序的安排可以确保政权实行和平与定期的交接。尽管民主的模式种类繁多，但是我们在不同民主模式之间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

公民的根本权利与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民主政治涉及公民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须能够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竞争性的选举，尊重个人和少数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障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法

治。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

专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在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由于民主是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须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而且由于在许多大国，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到某个场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这样就委托一些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机关。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码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相信人的理性，故其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通过投票表达的同意（点头）。若不相信人的基本理性，就只有靠砍下的人头来垒砌政权的合法性了。从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投票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使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彻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蛮政治。

民主政治认为每个人的价值尊严是平等的，所以不论贫富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选票的价值是同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作为人的资格是同等的，同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参政、议政与施政的能力又是不相等的，这才需要把最合适的人以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但又不仅仅是选举政治，仅仅有定期选举、竞选公平和选举结果真实是不够的。衡量选举的正当性的尺度不是由多少人自愿地参加了选举，而是有多少人被排除在选举之外。选举是体现民主的一个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内容。

选举虽然是按多数票的原则议决，民主政治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多数人说了算”。固然有许多事情在民主制度下是由多数或大多数人说了算，如领导人的产生、法案的通过等，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任何人和所有人们说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数人同意也不能剥夺少数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正是选举使得民主成为每位公民有权在公共领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才是使得社会成员都可以生活在文

明的政治环境之中的大德。民主政治不同于任何其他政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务实性，在于它尊重现实，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不必为迎合它而来重塑人的灵魂和改造人的本性。

民主政治的成功与其背后对人性的正确看法和对待是分不开的。与专制保障把统治者奉为至善的神明相反，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只有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并加以防范，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权者真的沦为无赖。相反，若断定掌权者人性高尚而在制度上不加设防，早晚要把掌权者宠成无赖。因此，为了政治家和掌权者自身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必须把政治家和掌权者假设为无赖。无赖假定导致了对掌权者的不信任，若对掌权者不信任，就不能让他们大权独揽，而是要从制度上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分立制衡，分权制衡制度也由此产生。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分立，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即分别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是一种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自由民主只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虽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不都实行自由民主，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绝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

到了20世纪，几乎没有公开反对民主。这当然也绝不意味着人

人都拥护民主，至少他不敢反对民主。这又导致了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抱有一厢情愿的看法，即认为民主是万能药，它包治一切。其实即便成功地确立了民主政治，其内部还有诸多的张力和艰难的平衡，在统一与效率之间、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冲突与认同之间等。事实上，对民主自身有很多的限制，很多事情是民主所做不了的；民主也不能提供英明的决策，它只是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民主政治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道德问题上的对错；民主政治也并不是越高越广泛就越好。

人是不完善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等，但诚如丘吉尔所说，民主政治虽然有许多不足，但还是各种政体中最可取的。只有民主才能给人类最多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尊严。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民主的真正优点不在于它能比其他政治形式更能自夸实现人间天堂，而在于有能力防止出现人间地狱。

民主政治在世界五大洲、各种文化传统中都扎下根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还在陆续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这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虽然难以照搬，但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文化差异和国情等借口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以上是对本书所选文章主要内容的概括。由于此书以西方民主为中心话题，就难以避免要介绍西方立场的民主观念，而这些介绍西方民主的文章中往往夹杂着以全球性的西化为追求目标的渴求，带有要民主就必须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等等种种打着西方世界烙印的思想标志。它们反映出西方学者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却未必是我们所能完全接受的理论。因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需以自己的眼光去对他们的诸般说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符合各国实际的分析，进而做出自己的审视和判断。在这里，在思想方法上坚持批判与借鉴，继承与扬弃，十分必要。